

网络空间中民族民粹主义的逻辑机理与类型比较^{〔*〕}

——基于网络“回音室”效应的视角

王云芳, 焦运佳

(中央民族大学 中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院, 北京 100081)

〔摘要〕网络空间的“回音室”已成为民族民粹主义话语的重要滋长地。在“回音室”中, 民族民粹主义网络传播与动员的演进机理为“选择性认同—叠加式酝酿—激进式煽动”三个发展阶段。当前, 欧美国家网络社会中的民族民粹主义思潮基本明确, 大多属于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 而中国网络空间中的民族民粹主义, 则更多是自下而上的带有平民主义色彩的社会动员, 具有现实诉求的特质。

〔关键词〕网络空间; 民族民粹主义; “回音室”效应; 网络民粹主义; 网络民族主义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19.04.009

当前, 欧美国家民族民粹主义思潮从普世性规范到排他性规范、从多元包容主义到激进种族主义、从温和防守性民族主义到极端民族主义的转变过程引发了学者们的强烈关注。显然, 网络空间作为民族民粹主义传播动员的重要工具、途径和触发因素, 其自身的扁平化、大众化特质与民粹主义平民化、民族主义排外性色彩的结合, 使网络空间中的民族民粹主义传播动员更显激进、难以控制。为何民粹主义者渴望达成的目标常常在网络中生产出不自由、暴力的副产品? 为何民族主义思潮在开放自由的网络中会带来民族主义冲突? 为何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在网络空间的结合比在现实生活中更具煽动力? 这些

正是本文需要回应的问题。网络“回音室”效应视角或许能为分析民族民粹主义思潮在网络空间中从温和到极化的传播与动员提供新的思路。

一、问题的提出: 网络“回音室”效应视角下的民族民粹主义

网络“回音室”的产生, 不仅成为滋生民族民粹主义的温床, 也改变了民族民粹主义的传播规律。那么, 到底什么是网络“回音室”效应? 网络“回音室”效应与民族民粹主义有着何种相似的特性?

(一) 网络社会中的“回音室”效应

网络“回音室”效应(Echo Chambers)是当

作者简介: 王云芳, 法学博士,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院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 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 焦运佳,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专业硕士研究生。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当前欧美国家民族民粹主义的崛起、进程与影响研究”(项目编号: 17BMZ121)的阶段性成果。

前网络群体行为的普遍现象,也被认为是群体极化产生的原因。^[1]关于“回音室”效应的概念,凯斯·R·桑斯坦(Cass R.Sunstein)明确界定为,当网民预设了某种观点和话题在网络中进行互动,网民倾向于选择让他们认同且愉悦的信息领域,最终形成内部环境一致性的网络小群体,经过同样信息的不断重复、强化,从而使网络群体认知固步自封甚至偏执极化。^[2]桑斯坦以此来隐喻网络时代信息传播的症候。

在网络中,人们更易听到与自己意见相近的声音,却自动排斥相反意见,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这种环境被称为“回音室”。当成千上万的网民在网络中聚集更多相似信息,并以夸张或扭曲的形式不断重复时,处于“回音室”中的大部分成员就会误以为这些歪曲的信息是事实的真相,进而减少了人们接受多元化声音的可能。

(二)“回音室”效应与民族民粹主义的网络交织

当前,随着网络社会中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思潮的日益重叠与兴起,欧美学界也愈发关注现代网络技术领域与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等政治思潮的关联性,侧重分析同质化的信息环境对大众的网络行为和政治信仰产生的具体影响。在此重点探讨网络空间中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叠加

而成的民族民粹主义思潮。

第一,民族民粹主义:从现实政治到网络空间。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认为,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意识,乃至沙文主义式的爱国主义情操密切相关。^[3]我国学者俞可平也认为,民粹主义经常与民族主义相互转化。^[4]由此可见,民族民粹主义与一般民粹主义的区别在于,它不仅是大众与精英之间的对立,而且是反自由主义元素和民族主义元素的叠加。^[5]如表1所示。

近年来,欧美国家民粹主义政党崛起过程中社交媒体的频繁使用,助长了网络民族民粹主义形态的生成。而网络民粹主义、网络民族民粹主义与现实政治生活中的民粹主义、民族民粹主义相比,凸显出更强烈的反精英倾向、狂欢式攻击性话语乃至非理性的排外主义、极端化民族主义情绪等。^[6]正如马吉得·霍斯拉维尼克(Majid KhosraviNik)所说,社交媒体因其可操作的网络技术和同质化的话语环境,使网民获得在现实社会无法满足的需求,导致网民追求情感与情绪的宣泄大于听取理性意义的价值引导,为自我话语的同质化建构的民族民粹主义思潮发展创造了动力。^[7]

表1 民粹主义、民族民粹主义不同形态的特质列表

一般民粹主义形态	民族民粹主义形态	网络民粹主义形态	网络民族民粹主义形态
反精英政治(社会)思潮 不满现状的大众运动 精英剥夺论政治策略 极端平民化批判性情绪	“种族问题”的政治讨论 民族主义平民暴力行动 外来者相对剥夺论 (反移民、抵制外国力量) 多元文化紧张情绪	反精英网络政治(社会)思潮 狂欢式的网络话语 非此即彼的网络道德审判 政治(文化)消费倾向	平民至上的沙文爱国主义 本国优先、民族排外主义话语 非理性的民族主义群体极化 极端化民族情绪及信仰危机

第二,“回音室”效应与网络民族民粹主义的关联性。网络空间中的“回音室”是民族民粹主义等各种思潮传播的重要场域。在“回音室”效应中,网络空间政治(社会)思潮的传播往往会从多元走向单一、从异质走向同质、从温和走向极端。纵观民族民粹主义在互联网中的演进脉络,可以发现网络“回音室”效应的“聚集”“划界”群体行为与民族民粹主义者“聚众”“排外”的集

体行为呈现出一致的特质,具有相似的演绎框架。即当涉及民族主义因素的议题在网络空间内广泛传播与讨论时,持有相似观点的民粹主义者迅速汇集在同一个阵营,在同质化的意识形态中发酵情绪化甚至攻击性、排外性的言论。此时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交织在一起,就如同聚集在一个巨大的“回音室”中。当民族民粹主义者通过煽动性的民族排外主义话语吸引其他网民加

入自己的阵营,并使民族民粹主义情绪在网络中被动员、组织和传播时,就呈现出“回音室”效应的叠加升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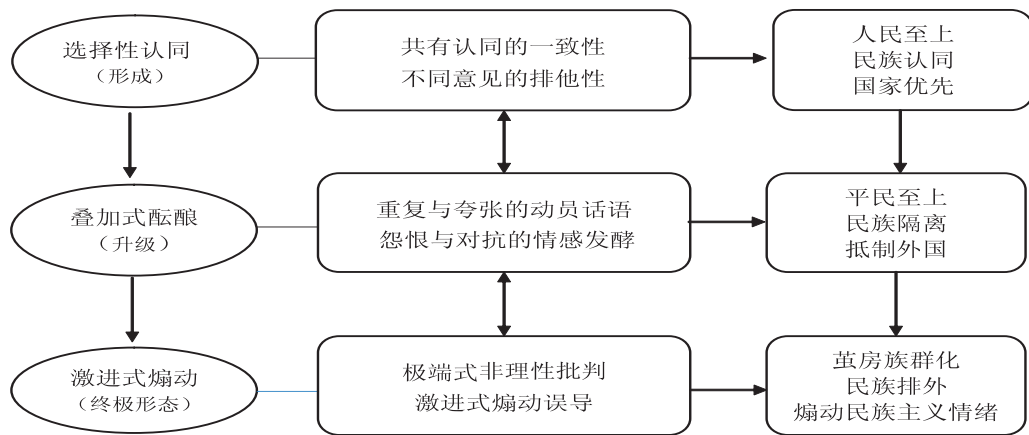
总之,网络“回音室”效应很好地回答了民族民粹主义思潮中部分个体在网络空间中从中性、温和的观点走向极化、激进倾向的原因,有助于探究民族民粹主义在网络空间中的传播动员机理。

二、传播与动员：“回音室”效应下网络民族民粹主义的演进机理

民族民粹主义与“回音室”效应相伴相生,在政治选举、社会议题表达、文化认同等方面形成了声势浩大的舆论洪流。弗洛里安·贾斯万(Florian Justwan)等学者^[8]指出,Facebook或Twitter上发生的许多民粹主义对话都是在“回音室”中进行的,在意识形态一致性和同质性的

环境中,网民不是相互辩论政治观点,而是不断强化和放大相同的政治态度。这可以概括为“选择性认同—叠加式酝酿—激进式煽动”的民族民粹主义网络传播动员过程,如图1所示。在第一阶段,网民认为人民、民族或国家利益受到胁迫时,互联网中原本分散的个体基于对大众、民族或国家的认同而迅速聚集在一起,形成选择性共有认同的网络群体;在第二阶段,网络群体中个体的情感不断放大,并通过不断宣扬夸张、扭曲的民族民粹主义话语,动员群体中的其他成员,导致个体不再接受群体之外的观点和看法;在第三阶段,群体中的部分成员在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感召下,诱发民粹主义的固化思维和偏激倾向,滋生批判现实的不满情绪、盲目排外的隔阂观念或抵制外国的对抗意识,甚至演变为线上线下的互动的现实抗争。

图1 “回音室”效应下民族民粹主义的网络传播与动员



(一) 选择性认同：“回音室”效应的形成关键

在网络空间中,选择性认同的聚众性心理是民族民粹主义者的重要价值工具和动员手段。在封闭性“回音室”里,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个体不断接触同质化的人群和信息,并倾向于将他们听到的“回音”当作真相和真理,进而过滤群体外的信息和异己的声音,强化了民族主义群体与社会中其他特定群体间的割裂。^[9]

第一,信息过滤:共有认同的一致性。在网络空间中,民族民粹主义“回音室”效应起始于民

族或国家的外部经济、政治、军事或文化等方面的威胁。此时,原本分散在网络各处的民族民粹主义者通过选择性认同,关注并过滤、筛选出与“人民至上、民族认同、国家优先”等相似的观点,构建出一个强大的群体“回音室”。正如巴特·博尼科夫斯基(Bart Bonikowski)在分析极右政治情况时指出,多样化的社会变化以及多元化的民族文化,让居于主体地位的群体感到威胁。经过接触政治和媒体言论,这种心理转化为对精英阶层、移民以及少数族裔、种族和宗教群体的不

满,从而激活了之前潜在的态度,形成一致的群体认同和信仰。^[10]由此可见,网络民族民粹主义信息过滤与持续传播的基础和前提就是具有一致的群体性认同。

第二,强化标签:不同意见的排他性。民族民粹主义者在网络“回音室”中的同质化倾向所导致的过度性后果就是敌对的排他性态度不断出现和强行“贴标签”现象。狄恩·普鲁特(Dean G. Pruitt)在研究群体冲突时发现,人们在社会交往中往往会避开自己敌视的人,并通过阻碍交往和干扰沟通推动敌对态度升级。^[11]这不但加剧了不同群体之间的误解,也使冲突迅速增多,和平解决争论问题变得非常困难。总之,正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凡·阿尔斯泰恩·马歇尔(Van Alstyne Marshall)和英国剑桥大学的布林约尔松·埃里(Brynjolfsson Eric)所认为的,“回音室”效应最终会导致网络社会的“巴尔干化”(即信息空间隔离和分化状态)。^[12]民族民粹主义者往往会因为带有强烈排他性群体认同感,在网络互动中对其他群体表现出疏远与背离。人们倾向于选择相似内容来强化他们现有的信仰,^[13]并通过“贴标签”的方式,抨击意见不一致者、表达排他性情绪,导致网络中弥漫着情绪化的谩骂、蔑视性的称谓和偏激性的话语。

(二)叠加式酝酿:“回音室”效应的升级进阶

在网络“回音室”中,为了争取更多网民的支持,原本由精英主导的民族主义叙事愈渐显现出民粹主义话语特征;为了获得更大的政治合法性,民粹主义者也策略性地借助民族主义进行动员,致使弥漫于网络空间的民族民粹主义话语体系更加丰富,建构出重复而夸张的强大动员口号,使民族民粹主义在网络“回音室”中不断升级。

第一,走向边缘:重复与夸张的动员话语。出于动员目的,民族民粹主义者总会借助夸张甚至扭曲的修辞和符号去感染、激励民众,将民族民粹主义话语口号化,并在网络中进行反复传播。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认为,当一个主张被充分地重复之后,重复之内就存在着

一种一致性,而且主张越简明扼要,重复的声明越会被嵌入形成大众行为动机的潜意识最深处。^[14]可以看出,在网络“回音室”中,重复夸张的民族民粹主义话语极易形成强有力的动员,从而带领具有民族民粹主义倾向的群体由温和走向激进、由中心走向边缘。

第二,情绪共鸣:怨恨与对抗的情感发酵。情感的共鸣、发酵和爆发是民族民粹主义“回音室”效应中的关键环节,^[15]其最终目的就是动员民族民粹主义情绪,激发民族民粹主义的情感动能。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指出,情感和注意是人们争相竞逐的一种有价值的物品,兴奋和团结能把人们吸引到集体行为中,而集体仪式、集体欢腾能创造充沛的情感能量。^[16]此时网民更多的不是关注事情的真实与否,而是追求自身情感能否得以宣泄。因此,在事实阐释让位于情感发泄的网络环境中,通过情感动员和宣泄,怨恨与对抗的民族民粹主义情绪很容易被激发出来。

(三)激进式煽动:“回音室”效应的终极形态

同质性民族主义情感经过网络群体成员重复、夸张和扭曲的民粹主义话语以及怨恨、不满与对抗情绪的强烈渲染,温和的个体或群体因不同的政治社会倾向而被相互隔离,并在同质效应与极化效应下,极易转变为极端个体或群体,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偏执极化的集体情绪和行动。^[17]

第一,极端式非理性批判。卡斯·穆德(Cas Mudde)认为民粹主义实质包括了两个群体,即“纯粹的人民”和“腐败的精英”。^[18]当涉及民族或国家的整体利益时,民粹主义“崇尚人民一反对精英”的敌我思想就被“我族—他族”或“国内—国外”逻辑取代。在此逻辑下,本族、本国之外的群体可能就被盲目分界,促成了强调本国优先、排外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相似排斥多元,同质走向极端。美国学者帕特·华莱士(Patricia Wallace)就曾提出,网民最初可能带着相对中立的观点看问题,但经过与“志同道合”的人商议后,他就可能从中间地段向边缘移动,最后产生

极端的观点。^[19]

第二,激进式煽动误导。民族民粹主义者常常利用并不具备普遍性的极端个案来否定特定民族或国家,从而引发现实中抵制特定民族或国家的集体对抗性行为。实质上此类极端、非理性行为的发生,就是激进式煽动误导的结果。当民族民粹主义在网络“回音室”中愈演愈烈时,民众往往会变得更加浮躁,变得狂躁不冷静。在网络上,当集体陷入这样一种好事狂热的状态时,其网络表达就会充满偏见和歧视,甚至夹杂专横残暴的民族主义暴力话语。这是民族民粹主义通过网络聚众和排外,进而演化为极化的关键特征。^[20]例如,2014年广州火车站暴力袭击事件、2016年兰州财经大学的“包子事件”被心怀叵测的网民夸大为民族问题,未经证实、凭空猜测的信息在网络中肆意传播、渲染与煽动,就属于激进式煽动和情感误导。

总之,民族民粹主义一旦进入“回音室”,特

别是当阶层固化、政治诉求非对称化等问题在网络中被折射后,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以及两者交织的网络民族民粹主义就更易汇集成群体化情绪,甚至上升为社会思潮的主旋律,使文化领导力乃至政治权力争斗成为可能。

三、差异与策略:“回音室”效应下网络民族民粹主义的类型比较

当前,网络空间已成为民族民粹主义思潮的重要栖息地。民族民粹主义与网络“回音室”效应结合后,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形式和表征。如表2所示。欧美国家社交媒体中的民族民粹主义思潮基本明确,大多属于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而中国网络空间中的民族民粹主义并未完全形成思潮,而更多属于自下而上的具有民族民粹主义色彩的社会动员,具有现实诉求的特质。^[21]两者在触发议题、话语宣扬、情感诉求等方面都存在着显著差别。

表2 当前欧美国家与中国网络民族民粹主义动员策略对比表

动员内容	动员空间	欧美国家网络空间的民族民粹主义思潮	中国网络空间民族民粹主义色彩
	动员范畴	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	自下而上的社会动员
各类议题动员	触发事件	恐怖袭击事件 难民或移民的流入 主流政党的不作为	涉外事件 民族纷争 草根维权
	动员领袖	政治领袖 民粹政党	网络名人 草根阶层
	大众回应	全民参与、全民公投	理性网民多,网络“愤青”少
	典型案例	2016年特朗普竞选总统 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 2018年欧洲政治选举	2016年“包子事件” 2016年“帝吧出征” 2018年中美贸易战
话语宣扬动员	动员平台	Twitter、Facebook、Instagram	微信、微博、知乎
	动员方式	诽谤辱骂、贴标签、情绪渲染 重复、夸张、频繁的短消息	谩骂侮辱、扣帽子 舆论审判、人肉搜索、网络恶搞
	动员话语	“让美国重新强大”“我始终站在美国民众的一方”“政治早已死亡,剩下的只有贪婪”	“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不转不是中国人”“我是草根我自豪”
情感煽动动员	动员思潮	反全球化、反外来移民、反政治正确	盲目排外、狭隘民族主义、仇官、仇富、仇权
	动员情绪	疑欧情绪、白人脆弱、反建制 惧怕、排斥、不满	批判现实、抵制外敌 怨恨、抗争
	动员后果	暴力冲突、游行示威 实现政治目标	网络舆情爆发 社会矛盾加深

(一)触发议题差异:领袖、事件与大众

欧美国家网络空间的民族民粹主义思潮主要表现在政治选举、公投等政治事件中。民粹主义领袖利用欧美国家社会不断出现的恐怖袭击

事件、难民或移民问题以及政治精英的腐败问题等热点议题触发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网络正是这些民粹主义领袖获取大众支持和选票的重要动员工具。例如在2016年的美国大选中,特朗普

通过 Facebook、Twitter、Instagram 等社交媒体大肆宣扬“美国优先”“白人至上”和“反政治正确”等思想。他高举维护国家、白人、草根阶层利益的大旗,以博取更多网民的认同,煽动他们为争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加入到抵制全球化、外来移民以及建制精英的阵营。这种行为唤醒了美国民众的爱国主义情怀,激发了白人的民族主义对立情绪,加深了中下层阶级反精英的激进思想。

中国网络空间中的民族民粹主义相较于欧美国家,虽没有上升到政治层面,仅是现实社会矛盾的延伸,但也同样存在着动员大众、制造舆情的意见领袖和积极回应、态度偏激的网民。一方面,意见领袖在涉外事件、民族纷争、草根维权等事件发生时,引导大众形成共同的意识形态和网络言论。例如,微博“大V”、微信公众号、知乎大神等具有一定粉丝基础和影响力的网络名人,他们声称是草根群众的代表,将民族民粹主义当作赚取流量、获得关注度的营销手段,在社会话题触发时,通过发帖、评论和转载等方式,发布不利于事件解决反使矛盾激化的非理性言论,从中“煽风点火”。另一方面,网络“回音室”共意形成也离不开网民的群体回应与影响。但在中国网络空间中,理性的网民数量居多。网络激进群体以网络“愤青”为主,并呈现年轻化的趋势。这些网络“愤青”“喷子”活跃于各大社交媒体,渴望被认可、喜欢被关注,喜欢谩骂却不喜思辨,由于缺乏对涉外事件、社会现实的深刻理解和认识,在群体“回音室”中极易被煽动和误导,使原本的爱国主义在封闭的网络空间,演变成盲目与过度的极端民族主义。

(二) 话语宣扬区别:平台、方式与话语

在欧美国家网络社会中,政治领袖、民粹政党倾向于采用重复、简单和夸张的网络话语宣传自己的政治观点和理念。如特朗普在竞选以及后来执政过程中,经常在社交 APP 中发表“把工作机会还给美国蓝领工人”“让美国重新强大”“我始终站在美国民众的一方”等口号和话语,运用词汇简单易懂、话题跳转频繁的民族民粹主义

话语营造不同于传统政治精英的亲民形象。意大利五星运动党的发起人贝佩·格里洛(Beppe Grillo)也经常通过社交媒体批判社会主流群体,用夸张的话语煽动民众的不满。此外,欧美国家网民在意见领袖的动员下,通过诽谤辱骂、贴标签等方式,抨击其他种族和精英权威。2019年3月4日,英国社交媒体中多个黑粉账号通过推文隐晦或直接地表达着自己的种族歧视和民粹主义思想,对英国王室进行诽谤和辱骂。这些推文大多数都会打上各种侮辱性“tag”(标语)来扩大影响力和煽动力。^[22]

我国网络空间中的民族民粹主义相较于欧美国家,并没有明确的政治规划,往往是在日常使用的微信、微博、知乎等平台上,以非理性、批判性话语进行社会动员。在网络“回音室”中,意见领袖通过对网民灌输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进行话语争夺和身份归属感认同,具有很强的煽动性。我国的网络民族民粹主义话语包含“批判现实、抵制外敌”的双重维度。一方面,民族民粹主义者对社会精英和现存体制表现出不满,在网络中散布“仇官、仇富、仇权”的攻击性话语;另一方面,民族民粹主义者也表现出对他国、异族的仇恨与排斥。网络“愤青”们主张采取暴力的军事行动或者抗争的民族隔离行为来解决问题,扬言“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从而挑动对特定国家或民族的矛盾。总之,在网络“回音室”中,网络“愤青”们通过强调自我与他者、我国与他国在利益上的相互冲突,形成了具有抗争意识和敌我思维的网络群体,诱发了民族民粹主义的偏激性倾向。

(三) 情感诉求不同:思潮、情绪和后果

在欧美国家现实政治中,普通民众的疑欧、白人脆弱等因素凸显,民族民粹主义者正是利用这种社会情绪煽动民众的情感诉求。由于网络扁平化有利于信息的快速传导,因此互联网也是其重要的助力工具。这种网下网上的联动效应点燃了民众排外、恐惧与愤怒交织的情绪。如大多数欧洲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正是利用了民众对难民或移民的排斥、对主流政党的不满,以及

对欧洲一体化的怀疑,从而借助网络煽动普通民众情绪,以赢得更高的支持率。由于欧美国家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极端宗教主义等问题相互勾连,情感煽动式动员往往会引发暴力冲突、游行示威,甚至恐怖袭击等为实现政治目的的激进行为。

在当前中国网络空间中,民族民粹主义的网络传播动员主要是因为现实空间在某种程度上缺乏利益诉求渠道,再加上带有明显倾向的情绪宣泄特质,形成了怨恨与抗争、发泄与批判双重交织的情感诉求。在国内层面,部分处于社会底层、草根阶层的民众在现实生活中失意、挫败的负面情绪,受到民族民粹主义思想的网络浸染,最终被升级为对现有体系制度、社会精英的不满和怨恨情绪;在涉外层面,网络“愤青”们喜欢通过给他人“贴标签”的方式发泄心中的不满,例如“小日本”“高丽棒子”等标签化的网络用语在社交媒体上层出不穷。此类民族民粹主义情感和话语中所暗含的敌我对立思维,构建和指认了作为他者的否定和批判的对象,明确了他们共同的“敌人”是对本国或本族存在威胁的“他国”或“他族”,进而可能迸发出强硬的外交立场和排外、偏执的防御性和应激性情绪。

总之,从不同国家网络民族民粹主义比较中可以发现,在网络场域,我国民族民粹主义思潮内在的核心要素,如强调“平民至上、批判现实”的民粹主义思潮、强调“爱国主义、抵制外国”的国家民族主义情绪,以及强调“社会隔离、斗争政治”的族群民族主义意识的合流,与欧美国家民族民粹主义思潮虽有相似之处,但大多局限在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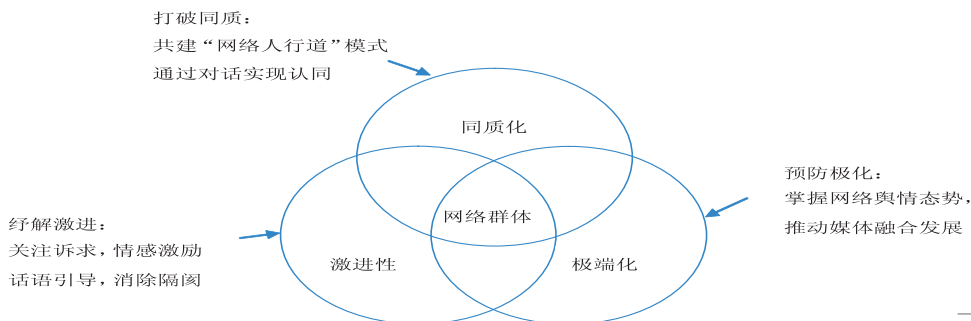
络空间中的观念生产与再生产。网络“愤青”们裹挟爱国主义的网络民族民粹主义所表现出来的道德审判、戏谑表达、网络恶搞、话语强占^[23]等方式主要限制在网络空间中。而当前欧美国家网络社会中的左翼或右翼民粹主义思潮却与民族主义思潮合流,不仅成为现实政治选举、公投、移民、难民等领域的重要助力,而且日益在极端恐怖主义、极端宗教主义等层面显露出来,夹杂着强烈的道德信念和民族仇恨。

四、余论：“回音室”效应下网络民族民粹主义的风险防范

伴随着民族民粹主义思潮在网络的生成与扩散,“回音室”效应下网络民族民粹主义散发出的偏激、极化色彩,对民族国家社会秩序及全球化进程都构成一定威胁。欧美国家的网络民族民粹主义思潮与现实政治中的民粹民族主义之间的互动叠加,显然会促发民众大范围的激进性、极端性观念,严重加剧现实社会的政治、族群及宗教对立的现象。而我国网络空间的民族民粹主义倾向也同样不利于我国国内的民族关系和民族团结,甚至对当前我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具有较强的消解性和破坏性。

为此,在网络“回音室”场域下,更需关注网络个体间的交互及其所导致的群体行为的形态变化。如图3所示,可以通过打破同质、预防极化的方式对网络民族民粹主义倾向进行疏导,最终营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信仰格局。^[24]

图3 民族民粹主义“回音室”效应风险防范机理图



综上所述,网络空间中的民族民粹主义表面上是标签化、工具化的空虚符号,实质是社会情感和社会心理的网络传导。阻断网络空间中民族民粹主义的传播与动员,更需要引导民族民粹主义情感从偏激走向积极,在具象化的时空和群体中扭转其演进态势。在民族国家框架下,如何防范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在“民族问题场域”的张力,如何警惕民族民粹主义从聚众性网络话语扩散到现实社会文化身份的分裂对立,也许正是网络民族民粹主义治理的未来趋向。^[25]

注释:

[1] 茧房效应、集群效应、鲑鱼效应、罗森塔尔效应等也表达了类似的极化倾向。

[2] [美] 凯斯·桑斯坦:《信息乌托邦——众人如何生产知识》,毕竞悦译,上海:法律出版社,2008年,第7页。

[3] [英]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6年,第83页。

[4] 俞可平:《现代化进程中的民粹主义》,《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1期。

[5] 关于民族民粹主义的研究,早期研究可参见 G. Ionescu & E. Gellner, *Populism: Its Meaning and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69; Paul Taggart, *Populism*, Open University Press, 2000; Stanley Ben, “Populism, nationalism, or national populism? An analysis of Slovak voting behaviour at the 2010 parliamentary election”,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2011, 44(4), pp. 257—270; 近期研究可参见 Benjamin De Cleen & Yannis Stavrakakis, “Distinctions and Articulations: A Discourse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the Study of Populism and Nationalism”, *Javnost — The Public*, 2017, 24(4), pp. 301—319 等。

[6] 网络民族民粹主义研究大多侧重探究社交媒体中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在话语、形态等方面的相互作用和重叠现象。可参见 Manuela Caiani & Patricia Kroll, “Nationalism and Populism in Radical Right Discourses in Italy and Germany”, *Javnost — The Public*, 2017, 24(4), pp. 336—354; Bart Bonikowski, “Ethno-nationalist populism and the mobilization of collective resentment”,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2017, 68, pp. 181—213 等。

[7] Majid KhosraviNik, “Social Media Techno-Discursive Design, Affective Communication and Contemporary Politics”, *Fudan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18, 11(4), pp. 427—442.

[8] Florian Justwan, et al., “Social Media Echo Chambers and Satisfaction with Democracy among Democrats and Republicans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2016 US Elections”, *Journal of Elections, Public Opinion and Parties*, 2018, 28(4), pp. 424—442.

[9] [美] 拉塞尔·哈丁:《群体冲突的逻辑》,刘春荣、汤艳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86页。

[10] Benjamin De Cleen & Yannis Stavrakakis, “Distinctions and Articulations: A Discourse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the Study of Populism and Nationalism”, *Javnost — The Public*, 2017, 24(4), pp. 301—319.

[11] [美] 狄恩·普鲁特, 金盛熙:《社会冲突升级、僵局及解决》,王凡峰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3年,第131页。

[12] Van Alstyne Marshall, Brynjolfsson Eric, “Global Village or Cyberbalkans: Modeling and Measuring the Integration of Electronic Communities”,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2005, 51(6), pp. 851—868.

[13] Elizabeth Dubois, Grant Blank, “The Echo Chamber is Overstate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Political Interest and Diverse Media”,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018, 21(5), pp. 729—745.

[14] [法] 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刘旭东译,北京:台海出版社,2016年,第125页。

[15] Gerbaudo Paolo, *Tweets and the Streets: Social Media and Contemporary Activism*, Pluto Press, 2012, p. 102.

[16] 冯仕政:《西方社会运动理论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13页。

[17] Susan Jacobson, Eunyoung Myung & Steven L. Johnson, “Open Media or Echo Chamber: the Use of Links in Audience Discussions on the Facebook Pages of Partisan News Organizations”,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016, 19(7), pp. 875—891.

[18] Cas Mudde, “The Populist Zeitgeist”,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2004, 39(4), pp. 543.

[19] [美] 帕特·华莱士:《互联网心理学》,谢影、荀建新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1年,第88页。

[20] 严庆、崔舒怡:《涉及民族因素的网络舆情解析——以群体极化的视角》,《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

[21] 与网络空间中西方民粹民族主义思潮相比,中国的网络民族民粹主义只是零星行为,还不能称之为思潮。下文为表述便利,统一提及为民粹民族主义。

[22] 对此,英国王室发布了一则社交平台的互动指南和方针,表示“不允许促进基于种族、宗教、性别、国籍、残疾、性取向或年龄歧视”,为网民营造一个安全的网络环境。

[23] 石立春、罗钧文、刘思涛:《网络民粹主义演绎特征爬梳与概念的探索性检验——基于2009—2014年606个网络民粹事件生成与演绎的扎根理论研究》,《电子政务》2018年第7期。

[24]桑斯坦所提出的构建网络“人行道”模式被认为是“回音室”效应的重要解决策略。即当社会大多数人分享一定程度的共同经验,拥有共同话题和任务,拥有多样化的信息和意见时,在讨论交流中才能对公共问题做出慎思明辨的决定。

[25][印]阿马蒂亚·森:《身份与暴力:命运的幻象》,李风华、陈昌升、袁德良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页。

[责任编辑:刘姝媛]